

中共「兩個一百年」目標 面臨之內外情勢分析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analysis of CCP's
“Two Centenaries Goals”

唐豪駿

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

所謂「兩個一百年」具體而言是兩個目標，且兩個目標都有明確的時間點，一是在中共建黨百年之際（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二是在中共建政百年之時（2049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其中，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硬指標是「脫貧」，因此，這幾年習近平積極推動「脫貧攻堅戰」，希望在2021年收官之年，能在「脫貧」上取得好成績，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達到中共官方所訂定的「脫貧」目標，對中共而言都不是太困難的事情，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不是只是單純的經濟議題，也不只涉及到國內層次，尤其是第二個百年目標是希望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更是牽動國際的敏感神經。以下將從四個層次分析中共的「兩個一百年」目標與展望：

壹、結構層次：崛起強權對既有霸權的挑戰

在美國霸權體系的結構下，中國大陸要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無疑是對霸權體系結構的衝擊。從傳統權力移轉理論的觀點，中國達到美國綜合實力的 80%，美國將可能發動先制攻擊，抑制可能出現的霸權移轉。這其中有兩個變數，一是當代綜合實力的估計較過去複雜，學界對於國家綜合實力的估計仍未有定論；其二則是目前未曾出現兩個核武國家發生戰爭的情況，學界也難以想像兩個核武大國發生全面衝突的爭霸戰會發生什麼情況，不過，當代戰爭型態的多元也明顯超過當年 1980 年代權力移轉理論提出時的假設。從這個脈絡來看，美中貿易戰、科技戰，甚至是已略見雛形的金融戰，都可視為是支配強權對崛起強權的先制攻擊。

如美國針對中國大陸進口產品祭出的第一波、第二波的額外課稅清單，明顯針對「中國製造 2025」戰略相關的產品與技術，希望能阻止，或至少拖延中國大陸從「製造大國」走向「製造強國」的速度。而在美國的打壓下，中國大陸也開始逐漸減少「中國製造 2025」，並低調的開始推動更長遠的「中國標準 2035」。美中貿易戰也隨著美國針對華為、中芯國際，以及海康威視等 AI 產業，而逐漸走向科技戰。美中爭霸已從經貿層面，擴及到智慧財產保護、科技研發創新、先進製造能量、行業標準制定等科技實力層面的競爭。

這種結構性的衝突，並不會隨著美國政黨輪替而改變。2001 年美國受到 911 事件的影響，聯合世界各國推動全球反恐戰略；十年反恐戰爭結束，美國發現中國大陸崛起的速度超乎預期，時任總統的歐巴馬遂於 2011 年提出「重返亞洲」政策，開始進行亞太「再平衡」(rebalancing)，希望能制衡中國大陸，維持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支配性地位。川普上台後，更是將亞太戰略擴大為印太戰略，強化美

日澳印的四方安全會談，並將劍鋒直接指向中國大陸。雖然拜登對川普多有批評，但雙方的爭執焦點主要在內政問題上，拜登政府基本上仍延續川普時期的對中政策，只是在手段上更重視多邊協調而非單邊主義。由此可見，將中國大陸視為競爭對手，甚至是主要威脅，已經是美國政治菁英的共識，中國大陸想要推動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勢必會受到美國的全力抵制。

貳、國際層次：維繫並強化區域的影響力

中國大陸亦知其崛起將會遇到美國的龐大阻力，因此，其積極把握並善用每個機會，加強中國大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例如在美國將重心放在反恐戰爭的十年間，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影響力幾乎是幾何級數的成長，成為在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強權。在美國宣布將「重返亞洲」後，中國則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積極提供融資給沿線國家興建大型基礎建設項目，藉此向外輸出過剩的產能。更有甚者，如斯里蘭卡在 2017 年因為無法償還債務，被迫將中國大陸承包建設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Harbor）連同周圍 15,000 公頃土地租借給中國大陸，由於漢班托塔港擁有極佳的戰略地位，因此中國大陸此舉被國際質疑存在「養套殺」的債務陷阱。不過，斯里蘭卡的案例雖然引發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國在政黨輪替後一度宣布暫緩中國大陸既有的數件大型基礎建設案，但總體而言，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戰略主導的對外投資仍然持續，且仍透過大型的政府投資來擴大中國大陸在沿線國家的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中國大陸仍未因此而減緩其在區域擴張影響力的宏觀戰略，反而藉由美中貿易戰而加速其維繫與鞏固區域影響力的步伐。舉例而言，中國大陸自 2009

年起，便一直是東協的第一大貿易夥伴，2010 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ASEAN+1）正式啟動後，東協自 2011 年起成為中國大陸第三大貿易夥伴，在 2019 年因為美中貿易戰的關係取代美國成為第二大貿易夥伴，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加速了短鏈的發展趨勢，東協在 2020 年取代歐盟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大貿易夥伴，顯示美中貿易戰與疫情帶來的全球產業供應鏈重組，反使中國大陸與東協的關係更加緊密。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恐將成為中國大陸的另一個發展契機。除了因中國大陸的嚴格控制手段使其在經濟上率先恢復生產力之外，歐美各國由於缺乏因應 SARS 等嚴重傳染病的經驗，導致疫情遠較中國大陸嚴重，嚴重削弱了歐美各國制衡中國大陸崛起的經濟實力。從中國大陸積極向海外輸出數以億計的疫苗，亦可看出其有意透過疫苗外交進一步擴大影響力。依照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即是中國大陸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能透過提供公共財與來向國際展現其能成為美國霸權之外的替代性選擇。

參、國家層次：堅持中共一黨專政之正當性

回到中國大陸國內層次，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但真正對中國有貢獻的成就遠低於其所造成的混亂，從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到近年來打壓香港自治、剝削新疆人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仍能堅持一黨專政，便在於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維持其統治的正當性。換言之，一旦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面臨停滯，或者出現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引發社會動盪，便顯示中國共產黨沒有能力再繼續帶領中國、讓中國人民有更好的生活，進而喪失其統治的正當性。因此，維持中國經濟穩定成長對中共而言，一直不只是

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

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大陸 GDP 快速成長，但是官員的集體貪腐，以及貧富不均、城鄉差距、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卻也迅速惡化，這無疑替中共的統治理下了不確定的因素。中國共產黨若失去了工農代表性，成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又如何貫徹無產階級專政的精神？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協助貧困地區全面「脫貧」，更具有政治意義，重新展現了中共對於底層人民的關懷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精神，提高了中共統治的正當性，有效協助中共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維穩」。

更有甚者，中國大陸 832 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將作為中共「宣傳樣板」，有助於中共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集體人權」、「經濟人權」等政治論述，顯示中共在意的是貧困人民的「吃飽穿暖」，「讓 13 億人吃得飽就是人權」，進而用來對抗「西方式的民主」。換言之，這些論述不但能用於麻痺內部人民的民主訴求，推遲中國民主化的進程，更能外銷作為對抗歐美意識形態的大外宣材料。

肆、個人層次：塑造習近平與毛澤東並列之形象與威望

最後從個人層次而言，習近平近年來不斷集中權力，有意改變過去江、胡時代的集體領導制度，形塑個人權威。最具代表性的舉措即為在 2018 年打破江、胡只做兩任總書記與國家主席的傳統，推動修憲尋求連任。習要集中權力，打破過去鄧小平立下的慣例，除了要在黨內排除異己外，更要取得民眾的支持。

因此，習近平上台以後大力度的「打貪反腐」，一方面有效打壓政敵鞏固權力，另一方面也希望重新取得廣大人民的認可。且習近

平在 2013 年提出「中國夢」，強調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並配合舉辦北京奧運等事件進行宣傳鼓動，讓民眾感受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國光榮感，進而對其統治產生認同感。就此而論，習近平任內實現了貧困地區全面「脫貧」，便凸顯當初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是階段性策略，並利用先富起來的資源協助貧困地區，最終仍實現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此將提高習近平的地位，甚至超過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以中興之主的地位與形象直追開國建政的毛澤東。

從反面而言，中共近幾年在美中貿易戰中損失甚鉅，在科技戰中更是因為高階晶片等關鍵技術「卡脖子」而一敗塗地，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展進入瓶頸，在國際上更因戰狼外交而屢受抵制，在國內則受到疫情影響而需要以「內循環」解決經濟發展停滯問題，在香港問題上焦頭爛額而不得不將香港內地化，在兩岸關係上又陷入「冷和」難以寸進。習近平想要說服黨內黨外，中國在其統治下成果斐然，所以必須由其持續領導前進，似乎也必須要提出一些具體的成果，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承諾，則提供了習近平一個良好的發揮基礎。

伍、結論

總而言之，從結構、國際、國家、個人等層次來分析「兩個一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涉及的並非單純的經濟問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更必須在各個面向都成為強國。

如今，美國已經認知到中國大陸對其之威脅，美中權力競逐涉及政治、安全、經貿、金融、科技、公衛等各個面向，中國大陸也盡力擴張其影響力，希望能在綜合實力不斷成長的同時，亦能取得

相應的國際地位提升。對內部發展而言，成功協助貧困地區「脫貧摘帽」，不但能維護中共統治的正當性，也能強化習近平個人集權地位的正當性，更能往外強化宣傳中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過在中共當前面臨國內外的嚴峻情勢下，僅是符合官方指標的「脫貧攻堅戰」勝利，是否能達到習近平預期的效果，尚有待觀察。

